

外國
文藝

AI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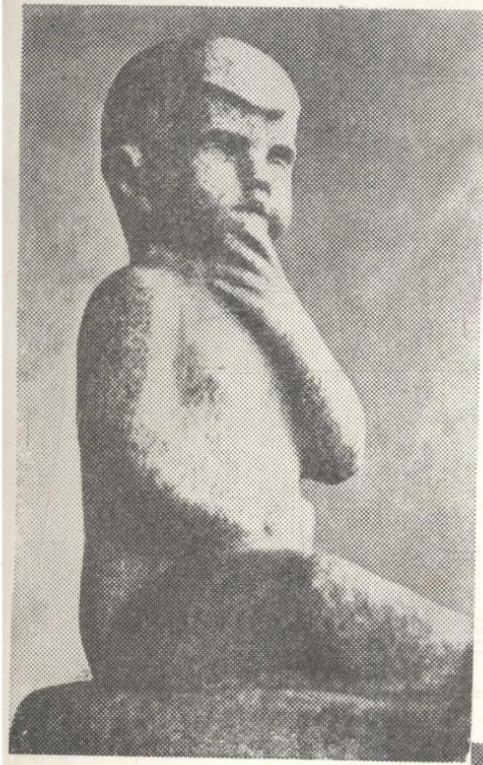
1984/3



EN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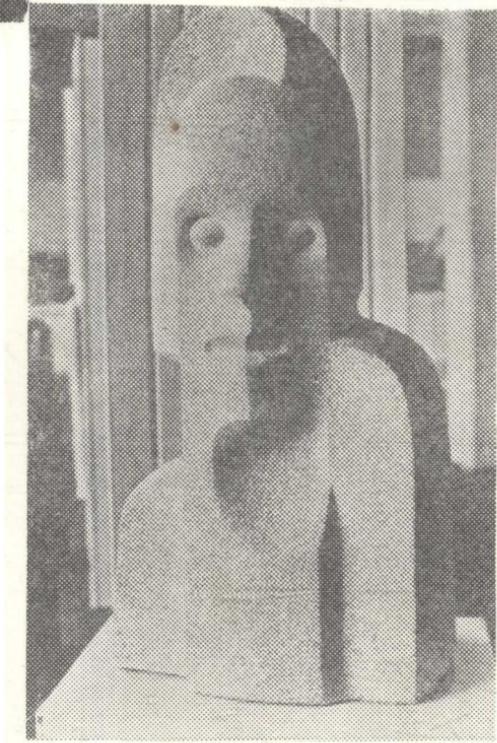
《女儿像》

[苏联]克·包曼尼斯



《力 神》

[苏联]阿·杜姆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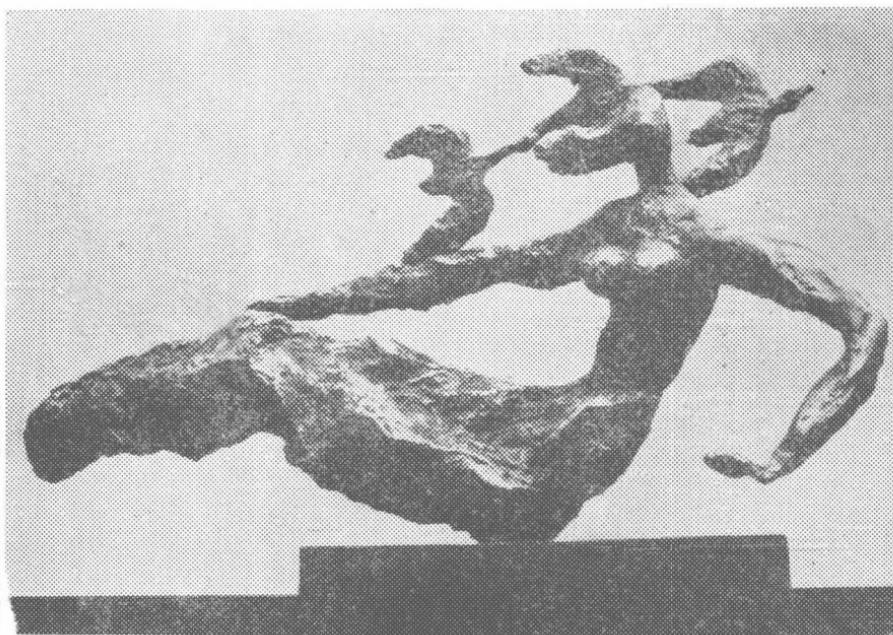
《图莱多斯·玫瑰像》

[苏联]阿·古尔比斯



《北方春光》

[苏联]阿·古尔比斯



W A

E N Y 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四年 第三期

目 录

特雷弗小说四篇	[英国]威·特雷弗作	(4)
网球场	刘玉麟译	(6)
歇凉小屋	刘玉麟译	(25)
浪漫舞厅	杨 怡译	(47)
死神在耶	勿天一译 万 紫校	(67)
巴西短篇小说选		(86)
海军上将式的夜晚	若·马·马查多·德·阿西斯作	
	刘正康译 范维信校	(88)
娇蝴蝶狂欢队	利·格乌托作 刘正康译	(96)
儿子的手	埃·维利西莫作 喻慧娟译 范维信校	(108)

-
- 散步 费·萨比诺作 禹 凡译 (115)
函授博士 马·列依作 范维信译 (122)
公寓里的女郎 希·阿尼济奥作 孙成敖译 (134)

儿童文学特辑

一行有一行的童话

- [捷克斯洛伐克]卡·恰佩克作 任溶溶译 (149)
邮递员的童话 (150)
强盗的童话 (164)
流浪汉的童话 (175)

史前故事三篇(童话)

- [意大利]阿·莫拉维亚作 袁华清译 (188)
鳄鱼、鹬鸟和爱跳舞的鱼 (189)
冰做的王冠化了 (192)
长颈鹿寻找自己 (197)

联邦德国小说四篇 (201)

- 棒球运动员 沃·克彭作 章鹏高译 (203)
威尼斯壁炉工可怕的经历 阿·安德施作 章鹏高译 (207)
一九五六年——皮尔茨年
..... 沃·希尔德斯海默作 章鹏高译 (214)
干柴里的火星 沃·施努雷作 徐 立译 (225)
-

从生活中的新事物到艺术中的新事物(论文)

-[苏联]塔·莫蒂辽娃作 吴元迈译 (241)
晚年(小说).....[西班牙]欧·加尔瓦里亚多作 周义琴译 (260)
冬晖(小说).....[日本]濑户内晴美作 王玉琢译 (274)
卷叶虫(小说)
.....[日本]竹西宽子作 姚祖榕译 郭建熊校 (291)
英国文坛近貌(报道)… [美国]角谷美智子作 晓 扬译 (302)
-

外国文艺动态

- 著名作家科塔萨尔病逝 (240) 1983 年度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评选结果(290) 贝克特亲自导演《等待戈多》(308) 法国《文学新闻》发表汉特克访问记(309) 雅克·迪凯纳获法国 1983 年度联合奖(311)
-

- 里加的雕塑艺术(美术家与作品)..... 章永浩 (312)
女儿像(雕塑).....[苏联]克·包曼尼斯 (封二)
力神(雕塑).....[苏联]阿·杜姆佩 (封二)
图莱多斯·玫瑰像(雕塑).....[苏联]阿·古尔比斯 (封三)
北方春光(雕塑).....[苏联]阿·古尔比斯 (封三)
图库姆城的自由纪念碑(雕塑).....[苏联]阿·杜姆佩 (封四)
封面设计..... 任 意
-

特雷弗小说四篇



1983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 1928—)的第八部长篇小说《幸运的傻瓜》(Fools of Fortune)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作为《企鹅丛书》之一，也在同年问世，其中包括他收在以前出版的五个短篇集中的所有作品。经过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特雷弗在英语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

威廉·特雷弗，真姓名叫威廉·特雷弗·考克斯(William Trevor Cox)，出生于爱尔兰的科克郡米切尔斯城；1950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在五十年代先后担任过历史教员和美术教员；从1955年起到1960年，从事雕塑创作；1960年他改行写广告说明词，直到1964年成为专业作家。

特雷弗在五十年代就发表作品，但是直到1964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老哥儿们》(The Old Boys)出版后，才受到重视。作者在该书中以一个同班同学的联欢会把一伙固执任性的老人串联在一起，用犀利的眼光观察他们的内心活动，并对他们装腔作势和敷衍搪塞的态度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老哥儿们》为作者赢得了1965年的霍索恩登奖金。他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发表了《膳宿公寓》(The Boarding House)、《爱情栏》(The Love Department)、《奥尼尔旅馆里的埃克多尔夫太太》(Mrs. Eckdorf in O'Neill's Hotel)、《戈梅斯小姐和兄弟们》(Miss Gomez and the Brethren)、《别人的世界》(Other People's Worlds)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显示出他善于用诙谐的文笔塑造愚昧、琐碎而自作聪明的人，刻划尔虞我诈的世

态人情。

特雷弗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并不比他的长篇小说逊色，而在取材的广泛和风格的多样上甚至可以说更有所超过。他的短篇小说的题材来自他出生的爱尔兰的偏僻地区、伦敦和英国的乡村；作品的基调有的明快，有的阴郁，根据内容起着变化。

《网球场》(The Tennis Court)和《歇凉小屋》(The Summer-house)是题为《马蒂尔达的英国》(Matilda's England)的三篇情节连续的短篇小说的一、二两篇。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小女孩马蒂尔达。在《网球场》中，马蒂尔达从一个从前的庄园女主人身上第一次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查拉库姆庄园的易主，阿什伯顿老太太的凄凉的晚景，这些都是她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了弹震症所造成的结果。那次网球会是老太太生活中最后一个高潮，同时也成为附近乡间的一个节日。欢乐的气氛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所打破。战争的阴影笼罩住马蒂尔达一家了。通篇以儿童的朴实天真的回忆写出，娓娓动人。在《歇凉小屋》中，马蒂尔达经历了丧失父亲和哥哥的不幸，还亲眼看到母亲同一个男人接吻。气愤和痛苦使马蒂尔达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从此她不再祷告。这两篇小说反映的生活面虽然比较狭窄，但是作者对一个小女孩的见闻和经历以及战争在她心上留下的创伤却写得相当生动。

《浪漫舞厅》(The Ballroom of Romance)是特雷弗的一篇著名的作品，写一个偏僻的爱尔兰山区农场上的三十多岁的老处女，她同缺腿的爸爸住在一起，种庄稼，做家务，帮他料理生活，每礼拜去舞厅跳一个黄昏舞是她唯一的享受。多少年来，由于她的处境，她的婚姻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她看上的男人对她没有兴趣，而对她有兴趣的却是一个同老母亲相依为命的酒徒。她深感生活寂寞，准备将来有一天同那个酒徒结婚。作者对那个姑娘的无可奈何的心情细腻的刻划寓意深远，引人深思：对一个在生活重担压迫下的农家姑娘来说，婚姻自由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死神在耶路撒冷》(Death in Jerusalem)对基督教和教士作了无情的嘲讽。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靠真的和假的基督教古迹

谋利的城市；保罗神父已经成为一个唯利是图、追求生活享受、丝毫没有母子之情的人，反而不及他弟弟有孝心。他们的母亲是在爱尔兰去世的，篇名叫《死神在耶路撒冷》就带有讽刺意味，基督教精神已经在耶路撒冷死亡了。

编 者

网 球 场

刘玉麟译

阿什伯顿老太太总喜欢让她叫作“快腿”的驴子拉着那辆双轮轻便马车在小道上兜来兜去。我们放学骑车回家老是碰上她，那时节，哥哥和姐姐正在上初中，我还在普里查德小姐的小学读书。我们兄妹三人，阿什伯顿太太最喜欢我，除了我年纪最小外，也说不上什么别的理由。“喂，我的马蒂尔达，”阿什伯顿太太总是用她那沙哑而迷人的声音低声招呼着。“马蒂尔达”，她总是恋恋不舍地重复着这个我不喜欢的名字，每个音节总是拖得长长的，互不相连。“亲爱的马蒂尔达。”她人非常瘦，相当长，看上去很单薄。我们都很体谅她，因为老太太已是八十一岁的高龄了。

我们碰上老太太的时候，她总是在找野花，如果在秋冬季节，她总是把马车停在庄稼人的大门口，让驴子吃这家的牧草。到了春天，她总是用一把小铲刀在篱边挖着花草，哥哥说，她挖的大部分是杂草；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她驾车在小道上兜来兜去，不是为了野花、杂草或者让驴子吃草。她是想在我们从学校骑车回家的路上遇到我们。

“查拉库姆庄园有一个网球场，”她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天

这样说。“你总有什么时候想打打网球吧，迪克。”她凝视着哥哥，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珠，就象上等煤那样乌黑透亮。她站在那里，穿着一件又长又旧的脱了毛的皮大衣，抚摸着啃嚼树篱的驴子的一双大耳朵，老太太显得有些古怪。她的帽子是用几个铜帽针别在灰白的头发上的。帽子是绿毡做的，已经褪了色，帽针一头有相当大的圆球，上面镶着小块绿玻璃。阿什伯顿太太常说，绿色是她喜爱的颜色，她常常拿下帽针让我们看镶在上面的玻璃，并且强调说这些东西不值什么钱。她也让我们相信，她那件脱了毛的皮大衣也不值什么钱，即令是在全新的时候顶多也只值五英镑。同样，她说她夏天穿戴的衣帽、她的皮鞋、那辆双轮轻便马车和驴子都是不值钱的。

“迪克，我的意思是，”她在一九三九年的那天说，“这不是一个象样的网球场，当然，从前这里的确是一个网球场。还有一个球网堆放在一间外屋里。还有一个滚子和划线器。还有一架割草机，这你自然是很需要的。”

“阿什伯顿太太，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在您的球场上打球罗？”姐姐贝蒂问。

“我当然是这个意思，亲爱的。我正好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战前在查拉库姆庄园我们确实举行过盛大的网球聚会。参加的人十分踊跃。”

“啊，妙极了！”贝蒂那时十四岁，迪克比她大一岁，我九岁。贝蒂象我们一样长了一头金发，但是比我要漂亮多了。她有一双湛蓝的眼睛，一张笑口总是开得大大的，初中里的男孩子们总是想法去吻她。她鼻子小巧，还有雀斑。她的头发光洁修长，泛着干草色，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使人吃惊。往日贝蒂和迪克总是在下午到小学来接我，我总是因他们而感到骄傲。迪克七月就要初中毕业了，在那和煦温暖的五月下午，贝蒂、我和迪克一道骑车回家，

我们都很难过，迪克下学期不会再来了。但是迪克说他很高兴。他已经长大了，和爸爸一样高，而且很羞涩。他已经开始抽烟了，这爸爸是不赞成的。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停下来走进一个废弃的茅屋，迪克可以在那里抽一支伍德拜因牌烟卷。他将要在农场劳动；以后这个农场就归他所有。

“打网球该有多好啊，”贝蒂说。

“那你一定得打，亲爱的。要是你想今年夏天打，那就得先把球场收拾好。”阿什伯顿太太朝贝蒂笑笑，那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使得她瘦削苍老的面庞也变得美丽起来。接着她对迪克笑笑。“迪克，前几天我走过网球场，使我忽然想到这一点。为什么不让这些孩子们来收拾一下呢？我想。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打球，而且把朋友们也一道带来呢？”

“您说得对，”迪克回答。

“你们何不在星期六到查拉库姆来呢？当然马蒂尔达也来。来喝茶，你们三个一道来吧。”

阿什伯顿太太对我们每个人都笑笑。她向我们点点头后，就上了那辆马车。“星期六，”她又重复了一遍。

“贝蒂，说真的！”迪克很生气地盯着妹妹，好象她得对这次邀请负责似的。“我不去，你要明白。”

他骑上车沿着那条狭窄、尽是尘土的小道驰去，高大的身影，脸庞通红，嘴里不断嘀咕着。我们在后面慢慢地骑着，一边谈论着阿什伯顿太太。“可怜的老人！”贝蒂叹了一口气，凡是谈起阿什伯顿太太，或者有人看见她坐在那辆马车上，周围的人经常就会这么说。

我一生难忘的第一件事就是爸爸弄断了一支自来水笔。那是一支黑白笔杆的大钢笔，颜色既象乌龟壳，也象大理石。那时的钢

笔就兴这种式样：两三种颜色混在一起，彩色斑驳，黑和绿，蓝和白，红和黑白。康韦·斯图尔特牌、华特门牌、黑鸟牌。活动铅笔的牌子叫爱弗释。

爸爸弄断钢笔的那天，我还不懂得这么许多；这是我以后在普里查德小姐的学校里才知道的。他折断自来水笔那天，我三岁。“这钱花得冤枉！”爸爸喊起来了。他在膝盖上把笔砸了，妈在一侧急得干瞪眼。妈说，不管是不是花了冤枉钱，把东西砸了，也没用。她从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拿出墨水和一支蘸水笔给了爸爸。他还是怒气未消，但是过了几分钟却又笑逐颜开。他吻了妈妈，一边把她拉到砸过钢笔的那个膝盖上坐下。迪克那时已经九岁了，一心一意在做作业，连头也没有抬。贝蒂也在场，但是我记不起她当时在做什么。

厨房变化不大。老的炉灶已经不见了，但是那淡橡木做的食具柜仍然在那里，柜门和抽屉上的铜把手都还在，搁架上还放着韦奇伍德^①设计的蓝色餐具，钩子上还挂着茶杯和长柄罐。天花板很低，厨房很大，呈长方形，里面有一个后楼梯，楼梯尽头有道门。有一扇门通餐具室，另一扇通洗碗间，还有门通走廊，从那里可走到其他房间或庭院里去。还有一个狭长的淡橡木桌子，抽屉上有铜把手，和柜子上的一个式样，还有几把橡木椅子，但是颜色比其他家具来得深，因为椅子用久了颜色是会变深的。这桌子也不再每周擦洗一次，铜把手也不再是锃亮的了。这些我都清楚，因为我常常到农场的住房去。

我清楚地记得，厨房里本来是点的煤油灯，有一天，也是我过五岁生日的第二天，有人来我们屋里拉电线作通电的准备。妈妈常常谈起阿加牌的电灶，当她带我们出去购物时，她会领我们到一

① 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英国陶瓷制作家。

家叫阿切尔的建材商店，去看奶白色的大号阿加牌电灶。过了一段时间，当电灶部的格雷先生看到妈妈来到时，甚至不走过来招呼一下。她会站在那里，丰满的身躯，红润的双颊，帽檐下露出几绺整齐的泛红的发丝，她抚摸着陈列的样品，打开电灶的门，掀起烤盘的大盖板。当我们回到家里，爸爸总要取笑她，知道她又去逛阿切尔商店了。到用茶的时候，妈脸上泛着红晕，切开火腿，把色拉递给大家。于是爸爸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嗯，我真该死，”爸爸会说，接着就大声朗读周报上的消息，不是有关附近农民的事就是有关新的县议会的各种计划。妈妈总是倾听着，接着他们两人都会点点头。尽管爸爸取笑妈妈，他们一直很要好。她羞得象一朵红玫瑰，爸爸说，他取笑她，就是为了要看她脸红。

在通电以前，我有一次做了个恶梦。也许不过是通电前几个月的事情，因为当我哭着下楼走进厨房时，爸爸拼命哄我、提醒我不久就要过五岁生日了。“马蒂尔达，那时候你再也不会再哭了，”他悄悄向我耳语，拥抱了我。“五岁的大姑娘不哭了。”我睡着了，但是直到现在使我难忘的并不是这情景，也不是消除了对恶梦的恐惧，也不是止住了的眼泪，也不是爸爸的拥抱，而是当我踉踉跄跄跑下楼梯走进厨房时爸爸妈妈的那副样子。亮着两盏煤油灯，弯曲的铁栅后面炉火通红耀眼，那个大黑开水壶还没有发出响声。爸爸睡着了，上星期六的周报还搁在膝盖上，妈妈在看一本书，那是从我们从未用过的餐室里的书架上拿来的。书名也许叫《真主的花园》，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两条牧羊狗蜷伏在桌子下面，当我打开楼梯顶上那扇门时，两条狗都惊叫起来，因为它们认为在那时刻不会有人来开那扇门的。“啊，喂，喂，”妈妈一边说，一边向我走来，听我诉说，我寝室的墙上出现了许多母牛。我还记得他们两人的那个形象，因为他们在一起显得十分幸福的样子，尽管妈妈还没有买阿加电灶，尽管爸爸有时不免为农场的事烦恼。

如今回顾往事，我家的确是相当幸福的，虽然和许多家庭比较起来，并不比他们更幸福。任何事情回想起来，不是令人沮丧就是令人欢欣，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往事，农场的幸福生活总是首先涌现在我脑海里。我还记得妈在厨房里烘面包的情景，面粉撒满了她丰腴的双臂，前额上沾满汗珠，因为厨房里总是很热的。我还记得爸爸粗糙的皮肤和他的微笑，以及他经常对牧羊狗吼叫的姿态。我还记得帮工乔和阿瑟坐在收割后的金黄色的麦秸残余上，喝着装在瓶里的茶，那天正好收割牧草。

我们的农场原来是属于查拉库姆庄园的，尽管我们的农舍离庄园宅邸还有两英里。往日，庄园里有花匠仆从，厩里养着马，马车来来去去，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庄园就荒芜破败了，因为阿什伯顿先生无法维持下去，最后到了一九二四年，他不得不多次抵押。当他在一九二九年去世的时候，由于负债累累，阿什伯顿太太不得不让劳埃德银行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因此我爸爸就买下了查拉库姆的农场。这是一个悲剧，附近一带的人们时常这么说，而真正的悲剧却在于，阿什伯顿先生战后返回家园时，变得十分古怪，庄园荒芜破败，他也毫不在乎。据爸爸说，劳埃德银行拥有查拉库姆庄园全部财产，但是允许阿什伯顿太太终生居住在这里。爸爸还说，如果发现劳埃德银行也拥有阿什伯顿太太本人，他也不会感到奇怪。“他酗酒致死，”人们时常这么议论阿什伯顿先生。“她眼看丈夫酗酒，但是不忍心去制止他。”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阿什伯顿先生完全是另一种人，那时他精力充沛，机警敏锐。那时的查拉库姆庄园简直是一片胜地。

阿什伯顿太太特别和我谈起她的丈夫。她感到很幸运的是，丈夫能够熬过战争，返回家园，尽管他应付得不怎么好。她解释说，丈夫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但这比战死要强多了。她告诉我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了，庄园的几个花匠，农场上的一些工人，以及他们

夫妇都认识的一些城里人。“我感谢上帝，”阿什伯顿太太说，“当他完整无缺地安全回到家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弄得七零八落，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也没有什么要紧。你懂得吗，马蒂尔达？”

我总是点点头，尽管我并不真正懂得。接着她会继续讲庄园的过去，她的丈夫，以及他们之间日常的话题。有时候她并不是直接对着我讲。她只是微笑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总是讲到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以及丈夫至少能够回来，她是多么幸运。她说，她一直在祷告，祝愿丈夫安全回来。每当一个农场工人或左邻右舍的人阵亡的消息传来，她就会感到丈夫安全回来的机会就多了些。“根据平均数的规律，”她解释说，“有些人总会回来的。过去几次战争总有人是安全回来的，你总是使你自己这么相信。”

这时候我总是再次点头，阿什伯顿太太就会说，回想过去，她因自己竟然把平均数规律运用到人的生死问题上而感到羞愧不已。这种做法简直和战争一样可怕：留在家里的妇女们由于恐惧和自私而变得残忍起来。残忍在战争中是很自然的，阿什伯顿太太这么说。

那时候她痛恨德国人，但也因此而感到内疚，因为德国人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嘛。但是当她谈到德国人时，在她语调里仍然余恨未消，于是我就从她告诉我的这些话来想象德国人是何等模样：他们吃黑面包，难得笑，他们吃生火腿，为人冷酷，阴沉，无情。她描绘德国人打仗时带的钢盔。她告诉我刺刀是什么样子，当我想到一把刺刀捅进人的肚肠并且搅动几下把人弄死时，就不能不感到恶心。她告诉我毒气、战壕以及士兵被活埋。从她讲述的神气，我明白她是一字不差地重复她丈夫告诉她的那些事情，也许就是这些事情使她丈夫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当她谈论战争的时候连声音都有些失常，似乎是在模仿她丈夫的声音，以及其中的恐怖情绪。她说，她丈夫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经常会哭泣，一哭就泪如

泉涌，不能克制。

那个星期六，我们骑车两英里去到查拉库姆庄园，迪克什么话都没有说。当他突然停下来把车靠在一座黑门上，并且爬过黑门到篱笆后面去抽烟的时候，他仍旧是不作一声。如果爸爸走过，他肯定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会看见贝蒂和我在小道旁等待，四周弥漫着迪克吸烟散发出来的烟雾。我们的任务是见到爸爸过来就向他发出警报，但是那天下午爸爸没有来。迪克抽完了烟，我们又上路了。

我们以前经常去查拉库姆庄园用茶。阿什伯顿太太说，我们是她仅有的几个客人了，因为她绝大多数朋友都过世了，她解释说，一个人到了八十一岁，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们总是在厨房里用茶，房间很大，充满油腻味，有几把椅子和一架无线电，还有阿什伯顿太太烧饭用的火油炉，她不想用大灶。用茶的时候有燕麦饼，有涂上黄油的黑白面包，还有阿什伯顿太太在市镇上买的一罐罐果酱，她也买了一块蛋糕，通常是水果蛋糕。喝罢茶，我们总和她一道在宅邸里到处走走，这时她会指指哪处房顶已塌陷下来，哪处梁柱已经在腐烂，哪处窗户已经打破。战争结束以后，大多数房间她就不用了，一九二九年，她丈夫死后，更多的房间她不用了。这些细节我们几乎都能背出来了，因为她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在外屋的一个房间里有一辆旧汽车，轮胎都没气了，花园里杂草丛生。杜鹃花被挤得枯死，还有醉鱼草、棠棣、绣球花也都同样枯萎了。

这座房屋是灰色的，正方形，两边还有较小的厢房，这是一座乔治王朝式样的石头房子，有很宽的石头台阶通向正门，门两边有柱廊，上有扇形窗。前面的碎石路上杂草丛生，在雨天走路就打滑，因为上面积满青苔。门厅的门两边原来是会客室和餐室，都有通往台阶的落地长窗。房屋四周伸展着几大片草地，现在被长长的杂草所覆盖，简直象一片草原。阿什伯顿太太提起那个网球场以

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它隐藏在大片灌木丛的后边。

“你看见了吗？”她问。“你看见吗，迪克？”她穿着一件过时的长衣裳，戴着一顶阔边白帽，还有一副太阳眼镜，因为下午的阳光十分耀眼。

网球场的草长得有一码高，已经和球网的两根发锈的支柱一般高了。“看，”阿什伯顿太太说。

她领我们去看马厩，走过那停着汽车的外屋，走进了一间更小的外屋。那里有一架割草机，和球场支柱一样发了锈，一个发锈了的划线器，还有一个铁的滚子。一个绕成一团的球网塞在我们头顶上的横梁中间。“他喜欢打网球，”她说。“他真的热爱网球。”

她转身往回走，我们跟着她走过马厩的院子，从后门走进厨房。她一边烧茶，一边谈论着她的丈夫。

我们吃着买来的水果蛋糕，一边听她讲，这些我们全都听过了，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值得再听听，因为有蛋糕、饼干、黄油面包和一罐罐果酱。在我们告别以前，她总是给我们姜汁啤酒，和一盘切成小块的巧克力。她告诉我们在战争开始后六个月他们本来会有一个孩子，但是后来流产了。“一切都不如意，”她说。她告诉我们在查拉库姆庄园举行过许多次盛会。有香槟酒、草莓和奶油，有的聚会还有游戏，人们都穿着花哨的服装。

“根本没有理由，”她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搞一次网球会。”

迪克叹了一口气，声音很微弱，阿什伯顿太太根本没有听见。

“网球会？”贝蒂嘟囔着。

“没有理由不搞，亲爱的。”

那天早晨，迪克和贝蒂有一番争论。贝蒂说，迪克当然应该去阿什伯顿太太那里喝茶，因为过去他是常去的。迪克却说阿什伯顿太太很滑头；这些年来她请我们去喝茶，目的就是一旦时机成熟，她可以叫我们去清扫那个旧网球场。“别说蠢话！”贝蒂大声嚷起